

鈴木

D.T. SUZUKI

大拙

中国

A BRIEF HISTORY OF

哲学

CHINESE PHILOSOPHY

小讲

[日] 鈴木大拙 著 吾久乐 译

非外借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鈴木
大拙

中國
哲學
小講

〔日〕鈴木大拙 著 吾久乐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铃木大拙中国哲学小讲 / (日) 铃木大拙著; 吾久乐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8

ISBN 978-7-301-30563-8

I. ①铃… II. ①铃… ②吾… III. ①哲学—研究—中国 IV. ①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35108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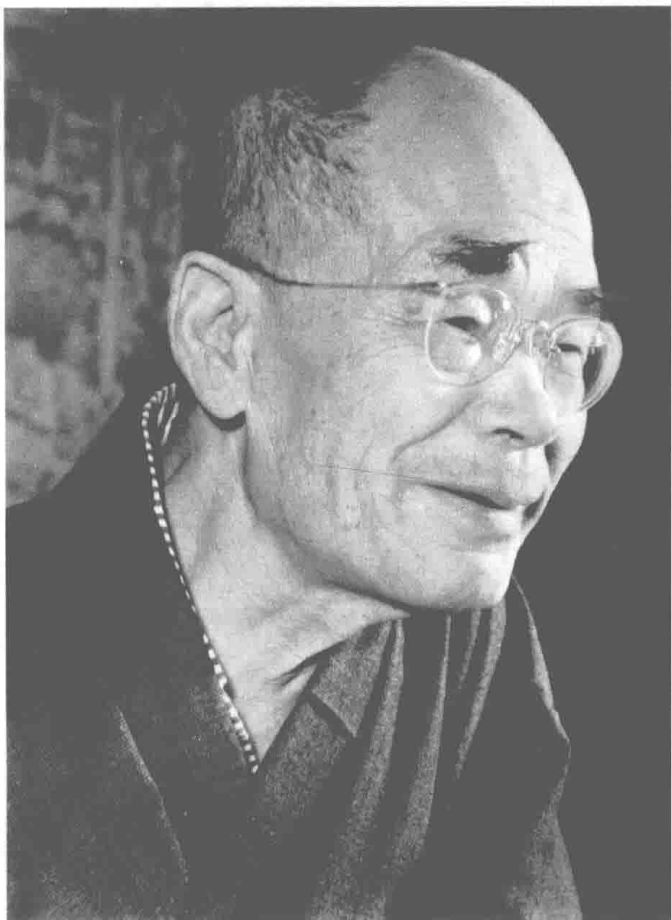
- 书 名** 铃木大拙中国哲学小讲
LINGMUDAZHUO ZHONGGUO ZHEXUE XIAOJIANG
- 著作责任者** (日) 铃木大拙 著 吾久乐 译
- 责任编辑** 吴 敏
-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30563-8
-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电子信箱** pkuwsz@pup.cn
- 电 话** 邮购部 010-62752015 发行部 010-62750672
编辑部 010-62757065
-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本 5.5 印张 75 千字
2019 年 8 月第 1 版 201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定 价** 48.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铃木大拙(1870—1966),本名为铃木贞太郎,名字中的“贞”出自于《易经》的“元亨利贞”。后因学禅,改名为“大拙”。日本现代著名的禅学思想家,被尊称为“世界禅者”。铃木大拙也是一位世界的思想家,得到海德格尔、弗洛姆、汤因比等的极大推崇,全部著作收于日本岩波书店出版的《铃木大拙全集》。

序

本书内容最早是以三篇单独文章的形式，于1907—1908年刊登在《一元论》（*The Monist*）杂志上。为了方便更多的大众读者阅读，我将它们集成一本小书，并对文本做了大量修改，加入更多内容，期待它能更深入浅出。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之后，中国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但很可惜只有屈指可数的学者真正理解中国人及其思想方式。作为多少带点系统性的首次尝试之作，这本小书旨在将中国最基本的思想特质（肇始于先秦时代）揭示一二，如果它能够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这个被长久误读的国度，那么它的目标差不多可谓完成了。

铃木大拙

东京

1913年12月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哲 学	15
阴阳二元论	16
实证主义	22
老子	28
一元论	33
超验主义	39
泛神论的神秘主义	48
第二章 伦 理 学	55
儒家	57
道家哲学	81
为己主义	94

2 铃木大拙中国哲学小讲

实用主义	102
礼乐主义	112
第三章 宗 教	123
五经中的上帝观	123
天与帝	140
墨子的上帝推理	158
译后记	165

引 言

中华文明的历史差不多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3000 年，传说当时三皇五帝^①开始统治黄河流域的诸部落。《尚书》这部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典籍^②，开篇收录了据传是大约在公元前 2400 年左

① 言古史者，必称三皇五帝，“三皇”通常指天皇、地皇和人皇，很可能是三种自然力的人格化，其纪年可追溯至中国历史的神话学年代。“五帝”尚在“三皇”之后，经常被提起，但具体指涉不定，流传最广的“五帝”是伏羲（青帝）、轩辕（黄帝）、神农（炎帝）、少昊（白帝）和颛顼（黑帝），是为五方上帝，年代大约在公元前 2852—前 2355 年。

② 《尚书》（书经）为“五经”之一。汉武帝建元五年，根据董仲舒的建议，五经之名始称，这五种儒家经典包括《易经》《诗经》《尚书》《礼记》《春秋》。

右的君主——尧舜^①的——施政典令。《尧典》《舜典》等为我们提供了不少颇有意味的宗教材料，由此可对中国早期的自然观窥得些许端倪。这一自然观流布至今，与其原貌只是略有出入。

不过在中国，哲学探索的真正觉醒应该说要到周朝开始显露衰落之相时，即公元前7世纪。在此之前，一代代的思想者想必已经活跃了很长时间了，而其思想成果之蛛丝马迹则保留在了后世的《周易·系辞》和老子《道德经》^②之中。

从公元前7世纪开始，一群璀璨若繁星的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以老子和孔子最为卓萃，开启了

① 尧和舜是中国上古时代的圣君，尧的统治年代约为公元前2356—前2255年，舜约为公元前2255—前2205年，但是不少权威学者，比如持“尧舜禹抹杀论”的东京大学白鸟库吉教授，不认为这是信史。

② 从字面意思看，“道”是道路或道理，“德”为德性，而“经”指经书。至于该书的性质和作者，详见下文。

中国哲学的早期阶段，历数百年而不息。^① 就仿佛在一个漫长单调的冬天过去后，步入了鸟语花香的春天。这一时代持续了大约四百年，是中华文明史中最为流光溢彩的阶段。由于它被秦朝戛然中止，所以这个时代也通常被称为先秦。

中国人在后世发展出更强大的理性能力，对人心的研究也更深入，然而从未超出先秦时期所划定的思想活动之畛域。中国哲学越来越精密，却很悲哀地在自由中迷失了方向，有时纯粹是乱逛。在先秦觉醒阶段，中国哲学忙碌投身于许多问题。整个宇宙对思想者来说都是焕然全新的，他们总能在注意力所致之处找到要进入的问题。他们的心灵是如此兼收并蓄，如此富有创造力。先秦时代过后，迎来了思想板结的时期，思想的

① 后代学者根据学说对先秦诸子进行分类，其数量之杂多令人困惑，可见这一思想时代有多辉煌。《汉书》编纂者班固将先秦诸子分为十家，分别是一、儒家（学者），二、道家，三、阴阳家（天文术数家），四、法家，五、名家（逻辑家或诡辩家），六、墨家，七、纵横家（外交家），八、杂家，九、农家，十、小说家。

血液注定只能在硬化老旧的血管里流动。

极富创造力的先秦时代遇到了它猝不及防的结局，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他采取雷霆手段来镇压含苞待放的自由之精神。始皇帝嬴政无法容忍任何异端思想，意欲“别黑白而定一尊”，故而在丞相李斯的建议下于公元前 213 年焚书坑儒。^① 极端手段让世人噤若寒蝉，他却是龙心大悦。

独立思想遭此大劫之后，国人的精神被打压到坍塌状态，流毒长达千年。^② 在此一千年期间，中国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原创思想家。秦始皇在思想界刮起的飓风毁灭性极大，留下一片狼藉，后人不再创建任何新的思想体系，只是不断致力于

① 《周易》在焚书坑儒中逃过一劫，乃是因为它被目为“卜筮之书”，不可能伤及秦始皇的专政。

② 也许秦始皇并不是造成该现象的唯一原因，不过中国人的心灵在此时开始显现出血气枯竭之状，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公孙龙“白马非马”等诡辩术兴起于这一时期的现象上窥得一丝端倪。

重新发现遗失在先秦时代的思想。后人在传世典籍中皓首穷经，每当有文献重见天日，必定详加研究，留下浩如烟海的注疏。对于载之史籍但已失传的文献，甚至会有作伪现象出现。故而这一时期伪书盛行。

佛教传入中国时，正逢中国思想史的这一惰性时期（公元前 213—公元 959），未遇多少抵抗便长驱直入。佛教发现道家与自家教义有契合之处，便采用了很多道家的现成词汇，同时也新创了不少词来表达当时中国人闻所未闻的那些观念。佛教经久不息地流行于文人士大夫间，为宋代（960—1279）的儒学复兴铺平了道路。中国人逐渐见识到了印度哲学尤其在形而上学和方法论领域的精妙高深。对佛教之所长的这一认知使原本对孔子亦步亦趋的儒家获一大推动力。

当儒士埋头于为新出土的经文传注时，佛教徒则忙着解说佛经之大业。他们不仅译出大量梵文佛经，而且还撰写了不少极具原创力的宗教哲学作品。灵感当然来自佛经，但他们的运化工夫

着实了得，中国佛教可以说是自出机杼，更深入地参悟到了万物之本质。

提到中国哲学史，很多人通常将它等同于儒家哲学史，因为除了在产生诸子百家的先秦时代，儒家似乎是硕果仅存的哲学。但如想要更彻底理解宋代儒学复兴的思想脉络，则千万不可忽略宋代以前儒家“蛰伏冬眠”那段时期佛教思想之发展的重要性。

中国哲学在宋代的复兴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大分水岭事件。^① 在沉睡千年之后，中国人的思辨如今相比起先秦时代，可谓更具慧识地——虽然不是更一往无前地——把握了斯芬克斯之谜题。佛教这一外来的新学说让中国思想家抖擞起全副

① 将先秦哲学和相对晚近的宋明理学结合起来看，我们就能够看清中国心灵在它漫长历史进程中的思辨发展。在前一个阶段，中国思想家独创性地去解决宇宙问题，未受到任何外来影响。（所谓的早期道家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是无稽之谈。）而在后一个阶段，宋代的哲学家们致力于从佛教中借力，去处理旧问题，即便他们从未公开承认过这一点。

精神来面对它。它提供了更多思想养分以供咀嚼和吸收进中国自有体系中。中国人也从未盲目生吞活剥。他们出于直觉，弃去佛教与中国人“功用”天性不太能擦出火花的部分。他们仅就儒家在自己思想练习中所提出的那些问题，从佛教中汲取灵感。公允地说，宋代的哲学复兴并没有提出全新的哲学问题，仍旧是在先秦儒学所划定的窄道上行进。在先秦时代，儒家仅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地位并非像后世那样至尊独大。当时的“诱惑”太多，先秦思想家不至于被某个既定学说缚住手脚。而宋代的情况则大为不同，宋代哲人从未想过偏离儒学之老路。他们熟悉许多西来的新思想，致力于对它们加以运用，仅仅是为了克绍孔孟，用来更深入地解读有如亘古真理般的儒家教义。他们从未想到过与儒家思想分道而行，宋代新儒学的原创之处便在于对旧体系的全新诠释。

严格来说，中国人不属于希腊人或印度人那样的思辨民族。中国哲学的兴趣永远以道德科学，

或者说实践伦理学为中心。无论推理有多精深，想象有多奇诡，中国人从未忘却事物的实践或曰道德面。他们拒绝被带往一个只有纯粹观念存在的清冷天宇，唯愿紧紧与世间关系相偕行。对于那些肉身拘于大地上的仰望星空者，他们投以一笑，因为思想再如何盘旋九皋之上，尘世间的命运终是不可能改变的。这是我们在研读中国思想史的时候必须铭记在心的。儒家的功用和保守特质给它烙上了一个永久的封印，使它永不能踏上彗星轨道漫游。

宋代之后便是元朝。短命的元朝并未给中国哲学史带来多少可值得书写的贡献，留下的几乎是空白。然而到了明代，却诞生了一位不世出的道德完人、思想巨人王阳明（1472—1529）。他是涤荡中国人心灵的宋代新儒学的绳其祖武者。虽然王阳明算不上从儒学出走的独立思想家，但他以惊人的原创力，开辟出一条肯认并实现孔孟旧学的新路。

在大哲王阳明逝去之后，中国哲学史重新又

被乌云笼罩，中华大地始终没有出现那种冲破万马齐喑的新思想。辛亥革命以来，万象更新，但就思想领域而言，保守主义这一鸦片的过量使用已造成一种如梦似幻的惰性状态，中国哲学如何清醒过来乃至于奋起，都始终是个未知数。

西方思想文化进入远东其实已经有些年头了，能从破敝不堪的哲学用语、传统与迷信中挣脱出来的中国人却还不及万一。辛亥革命给中国的政体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大众仍未充分意识到 20 世纪思想运动的重要意义。这种现象当然也能用在亚洲诸邻国身上。不过，当这位东方巨人完全醒过来，开始大力利用西方的方法论和科学，中国必能创造出与其悠久历史相称的伟大成就，为人类思想做出原创贡献。目前绊住中国人，使之在人类文明大步前进的这个世纪裹足不前的，并不在于中国人缺乏思想能力，原因仅仅是他们用来探索大自然和心灵的方法太老旧。方法论是知识的钥匙。假使中国人一改对现代思想活动的态度，中国那浩如烟海的知识宝藏造福全世界的

时代必定会到来。

先秦时期产生了整个中国哲学史上最丰硕的原创思想。文明的潮水浩浩汤汤，再加上有利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国人的心灵便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对生活和宇宙的大胆思辨中。它不受过去的羁绊，完全地表达自己，大踏步走入一片从未被人类涉足的处女地。自然选择还未曾将某一种对生活的定义，“钦定”为普遍适用于中国人有关国家、道德和思想特性的学说。诸子百家，百花竞放，竞争自由又激烈，时代仍未宣布哪一家是最合适的生存者。儒家不过是苦苦求生的诸子之一。道家则还未成有系统之一家。所谓的异端，与正道同台竞技，毫不畏惧。由于言论自由，不受传统和学问的专断裁制，每个有独特想法的人似乎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听众。如果当时的印刷和流通技术和现在一样发达，无法想象这一先秦时期的中国思想世界会呈现出何等盛况！

中国人的心灵似乎在这一时期耗尽了血气，因为在接下来的悠长岁月中，再也没有类似原创